

陶铸与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敖文蔚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是在豫南、鄂中和鄂东三块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37年12月至1940年5月,陶铸与杨学诚等在鄂中重建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为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

1937年11月,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同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石瑛等爱国人士洽商,决定以湖北省建设厅合作委员会的名义,在鄂中应城汤池举办“湖北省建设厅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以便将抗日工作深入农村,宣传、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抗战^①。不久,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民运部长董必武和中共湖北省工委的派遣下,当时担任省工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的陶铸,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去汤池领导训练班和开展鄂中地区党的工作。

1937年12月下旬,汤池训练班开学后,陶铸在培训农村合作人员的同时,即把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放在重要地位。当时,训练班学员来自东北、华北、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地,他们都是党组织通过其外围群众团体挑选输送的进步青年。这些青年虽然热情高,决心大,但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和吸收那些懂得按照共产党的主张领导抗日救亡斗争,并能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积极分子入党,乃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为了领导训练班和地方党的工作,陶铸在开学之初,即以师生中已有的共产党员为基础,建立了党的支部,由李华任书记,并由陶铸代表湖北临时省委直接领导该支部。随后,即在训练班和地方开始了发展党员和重建党组织的活动。

为了在训练班发展党员,陶铸作了大量的工作。在革命理论教育方面,训练班在学习合作社信贷业务的同时,专门讲授革命理论,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党课、农民运动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课程^②。陶铸亲自给学员讲课。他经常抓住重大问题,组织学员开展课外讨论,引导青年用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武装头脑。同时,陶铸还提倡党员与非党员广泛接触,采用谈心、交友等方法,了解学员们的思想状况,从中选择重点培养对象。为了培养过硬的作风,使之适应将来艰苦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陶铸以身作则,与师生一起吃糙米、住破庙、睡地铺。这对刚刚离开大城市和学校环境的青年来说,的确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和锻炼。由于陶铸坚持以革命理论和党的抗日主张武装全体学员,迅速提高了他们的理论水平和爱国主义觉悟,了解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发展党的组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为了建立地方党组织,陶铸于1938年春,派负责地方工作的共产党员蔡承祖到应城膏盐

矿区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同时组织群众和发展党员。他们一方面寻找红军转移后隐蔽下来的老党员、老团员、老红军和老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另一方面，发现和培养思想进步、要求革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吸收他们入党。在此基础上，1938年2月，由地方党员单独组成一个支部，该支部仍由陶铸代表湖北临时省委直接领导。1938年5、6月间，由于党员人数不断发展，湖北省决定成立中共鄂中特委，派刘青担任特委书记③。

1938年5月，汤池训练班已将300多名学员以合作指导员的名义陆续分配到应城、京山、钟祥、天门、汉川、云梦、安陆和荆门等县，并在这些县成立了“合作事业办事处”。鄂中特委通过这个机构，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城区，训练班学员将各阶层人士组织到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和抗日联合会中去。在农村，则将农民群众组织到农业生产社、农业信贷合作社里去，使他们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强大抗日力量④。在这之中，训练班派去的党员以农村合作指导员的身份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而陶铸则是这一工作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他经常以巡视合作指导员工作的名义，亲自到鄂中各县推动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指导建立党的组织。

由于陶铸的积极工作，鄂中地区许多县的党员发展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进行很快。在应城，陶铸和鄂中特委把工作重点放在膏盐矿区，首先成立了中共应城矿区区委，随后在较短的时间内成立了以徐休祥为书记的应城中心区委。在京山，陶铸从汤池训练班派顾大椿和陈玉虹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先后在官桥铺、孙家桥、石板河、丁家冲和县城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在钟祥，陶铸于1938年1月派鄂中特委委员刘慈恺带领训练班毕业的共产党员谭扶平、袁立和马仲凡等人，与当地坚持斗争的杨筱霖、谢威等一起，以办农村合作社的名义秘密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7月，成立了以刘慈恺为书记的钟祥县委。1938年4月，成立了荆门县委，以陶铸派去的训练班学员郑速燕任书记。至武汉失守前，鄂中特委共有党员300余人，所属单位除应城、京山、钟祥和荆门县委外，还成立了天门、汉川两区委和汉阳工作委员会⑤。

1938年11月，陶铸一度离开鄂中后重新返回，此时的鄂中地区已经沦陷，他在以主要精力投入抗日军事斗争的同时，仍先后参加鄂中和鄂豫边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工作。1939年1月，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鄂中区党委在随县长冈店成立，钱瑛任书记，陶铸任统战部长兼管军事工作。10月，为了统一鄂豫边区党的领导，中原局决定成立鄂豫边区党委，陶铸任委员。

在陶铸等同志的努力下，鄂中地区各县党组织得以重建和发展，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准备和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武汉沦陷前鄂中地区为国民党统治区，那时国共关系虽然较好，但要在训练班宣传革命理论，讲授游击战争是不允许的。武汉沦陷后，特别是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顽固派限制中共的抗日活动，积极反共。在此情况下，要坚持训练班的工作，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必须尽可能取得各种爱国势力在政治上和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持。这样，建立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显得很重要了。陶铸在鄂中时，他不论是否肩负统战工作的专

职，都自始至终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正规部队及地方武装，甚至封建帮派组织，建立和坚持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结成统一战线，最重要的工作是团结李范一和孙耀华。李范一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曾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他作事公正清廉，德高望重。抗战初期，李范一是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具体负责汤池农村改进实验区的工作。汤池训练班开办时，他任训练班主任，主管后勤工作。李范一愿意为训练班出力，主要是因为他厌恶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而将抗战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人。对于这样一位爱国人士，陶铸不仅以自己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救国救民的政治热情深深感动他，而且要当时担任汤池农业改进区供销合作社经理兼训练班教师的共产党人许子威，认真搞好合作社的一切事务工作，主动团结他，从而博得了他对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李范一当时即说过，他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但只有依靠艰苦奋斗的共产党才能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贪污腐化的国民党是不行的^⑥。他还亲自写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士大夫也”的条幅，贴在陶铸宿舍的墙上，以表达对陶铸的敬重之情。后来，国民党特务头目徐恩曾等从武汉专程来汤池调查和监视训练班的活动。由于李范一与之周旋，巧妙地应付了他们的检查，使训练班得以继续开办。爱国民主人士孙耀华原任中国农民银行汉口分行农贷部主任。在李范一的推荐下，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孙耀华接替弃城逃跑的国民党应城县县长鲍佛田的职务，并兼县游击司令。孙耀华接任时，鲍佛田不肯移交。任国共合作的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顾问的陶铸，立即率领部队，亲自找鲍佛田谈话，鲍佛田才交出印鉴。孙耀华上任后，由于没做过行政工作，更没有带兵打过仗，有畏难情绪。陶铸即向他介绍应城县及鄂中一带抗战形势和有利条件，鼓励他大胆工作。在陶铸的帮助下，孙耀华顺利地接受和改组了国民党应城县政府，建立了抗日民主县政府和游击司令部^⑦。

1939年1月，中共鄂中区党委成立，陶铸任统战部长。此后，他抓紧对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地方部队进行统战工作，均取得一定成效。

早在1938年底，陶铸在随县均川和长冈店担任第五战区抗委会顾问和主持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的实际工作时，即注意团结国民党军队。他不但动员群众帮助国民党军队，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向国民党部队输送抗日军政干部，以利建立统一战线。在此期间，他熟悉了国民党第五战区各个部队的政治态度，由此决定统战的重点对象。1939年4月，在取得孙耀华的同意后，陶铸派孙耀华对国民党进步军队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川军第一二二师第七三一团团长刘景素和桂军第一七三师师长钟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孙耀华的努力，这几支国民党军队不仅在武器装备方面支援中共游击队，而且配合中共游击队作战^⑧。

以李又唐为队长的国民党应城保安队，在应城沦陷后，经过我党的工作，被编为应城抗日游击司令部（简称“应抗”）总队第二支队。1939年春反“扫荡”时，该部全部溃散，李又唐只身投靠此时已向右转的国民党湖北省第三专署专员石毓灵。由于陶铸与李范一共同作石毓灵的工作，李又唐才收集溃散队伍，继续抗日。1月底，“应抗”总队整编时，李部被编为第二支队，李又唐为支队长，使鄂中的抗战形势一度有所好转。

自1931年起，鄂中有一个分布很广的封建帮派组织“汉流会”。日军侵占鄂中时，在汉流会头目的欺骗和逼迫下，很多工农群众加入了汉流。根据陶铸的分析，汉流虽然成份复杂，破坏性大，但大都出身贫苦，不甘当亡国奴。如引导得法，汉流可以变成一种抗日力量，否则就会被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寇所利用。1938年春，鄂中特委举办了汉流大哥训练班，陶铸亲

自参加讨论训练班计划。在陶铸和鄂中特委的指示下，应城、京山、钟祥、天门和汉川等地的党组织在开展群众工作的同时，开始了争取、改造和团结汉流大哥的工作。应城中心区委还成立了“汉流工作委员会”，并派党员与汉流直接接触，进行争取工作。当时，国民党竭力阻挠中共争取汉流，国民党应城县长鲍福田四处张贴取缔汉流的布告，并以禁止汉流活动为名将郭仁泰等汉流头目逮捕，投入牢中。陶铸闻讯，一面立即和应城中心区委沈少华一起走访各“码头”寨主，组织“鄂中汉流大同盟”，并亲自起草大同盟抗日宣言，广泛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一面通过李范一等有威望的爱国人士开展营救工作，从而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郭仁泰。郭仁泰出狱后非常感激陶铸，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以报答救命之恩。应城沦陷后，郭仁泰将其组织的汉流武装拉到陈家河湖区。12月中旬，在陶铸的指示下，这支部队又开到京山丁家冲游击据点，后被编为应抗第三大队，郭仁泰任大队长。为了改造这支部队，陶铸亲自批准郭仁泰为特别党员，并帮助他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提高部队的爱国主义觉悟^⑩。

1939年春天，日军进行“扫荡”，郭仁泰在形势紧张时发生严重动摇，当了伪军。鄂中区党委认为郭仁泰拥有1000多人的兵力，势力较大，决定再次争取他，并委派陶铸去做郭仁泰的工作。陶铸不顾个人安危，先是通过在郭部从事地下活动的中共党员安琳生等与郭仁泰的得力助手李春山接触。接着，他亲自找李春山谈话，希望他劝说郭仁泰反正。后来，陶铸还派人直接找郭仁泰面谈。经过一系列的工作，郭仁泰终于承认了错误，并率部反正。1940年1月，郭仁泰部经过初步整顿，正式编为豫鄂挺进纵队第六团队，郭仁泰任团长。后来，虽然郭仁泰只身投敌，但这支经过党教育和改造的部队，仍为抗日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陶铸在鄂中地区的统战工作，广泛地团结了各界爱国力量，扩大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顽固派，因而壮大了抗日力量，对日本侵略者及伪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三、开辟鄂中抗日游击区

鄂中北枕大洪山，南濒洪湖，东接平汉路，西含襄河，山地平原湖汉兼而有之，地形复杂多变，是开展游击战争理想的战场。周恩来和董必武派陶铸来鄂中发动游击战争，具有远见卓识。陶铸不仅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而且组织过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出色地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是一位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领导干部。

陶铸等人在鄂中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了三个阶段。

准备阶段。武汉沦陷前，由于汤池训练班的开办和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为游击战争提供了干部，也由于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打通了到工农群众中间去的道路，鄂中游击战争的准备是比较充分的。

汤池是鄂中抗日游击战争的策源地。1938年春节的第2天，陶铸在汤池邀请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7队举行的座谈会上即表示，如果武汉失陷，就要开展游击战争，还必须建立根据地，否则就成了游击主义^⑪。陶铸在鄂中准备游击战争的工作得到了湖北临时省委的坚决支持。1938年5月，湖北临时省委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作出了陶铸继续以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身份留在鄂中，帮助鄂中特委组织武装，准备游击战争的决定^⑫。于是，鄂中人民在陶铸和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的领导下，加紧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

汤池训练班开始时，陶铸即坚持以武装抗日的思想教育全体学员。训练班讲授游击战争

的战略和战术，把游击战争的理论作为重要课程。同时，陶铸对军事训练也很重视，经常组织学员进行夜行军和野外作战演习。即使隆冬季节，陶铸仍足踏草鞋，在雪地上指导学员训练。

进行武装斗争必须要有武装。1938年春，陶铸指示许子威从汤池农业合作社的资金中拿出洋3600元购买枪支，后由董必武托人从香港买回24支德国造驳壳枪。武汉沦陷后，以这批武器为基础，成立了汤池手枪队。1938年5、6月间，陶铸在京山石板河开展统战工作时，发动石板河联保主任黄定陆，将拥有乡政权的农民武装组织起来。鄂中沦陷时，黄定陆领导的京山独立队投入了抗日战争。同年夏，陶铸还指示应城潘家集党小组的戴迪安和蔡松云筹集武器，戴迪安等利用国民党县政府默许膏盐矿商可以买枪自卫的条件，通过购买和捐献，筹集了8条枪，即着手组织抗日武装。10月29日应城沦陷后，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应城县潘家集商民自卫队^⑬。

发动阶段。1938年10月，武汉和鄂中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已于8月间离开鄂中的陶铸只身从沙市转道宜昌，于11月上旬回到丁家冲，与杨学诚及鄂中部分抗日武装会合。鄂中特委当即要他负责军事和统战工作，他便与杨学诚一道，开始集中与整顿部队。

这时，鄂中特委在丁家冲能够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只有蔡松云等带领的应城潘家集商民自卫队，一共13人，8条枪。为了加强抗日武装，迅速开展游击战争，陶铸派鲁尔英把武汉沦陷前筹集的武器从湖区带上山，并指示将所有能集中的抗日武装汇聚起来。经过联络和动员，黄定陆带领的京山独立队、经我党改造的郭仁泰带领的队伍和邓先柱带领的矿区工人武装，先后集中于丁家冲、猴子凹和李家冲一带。当时，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沿途丢下很多枪支，各地党组织便发动党员和群众收集武器，因此，各路队伍不但人数增多，而且都拥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如潘家集商民自卫队很快发展到6、70人，5、60条枪。

11月下旬，在陶铸的领导下，孙耀华在丁家冲一面着手重新改组应城县政府，一面组建应城抗日游击司令部，将所有到达丁家冲一带的应城抗日武装编为3个大队，由县长孙耀华兼任司令，许子威任副司令，张文津任参谋长。此时“应抗”已发展到500余人。12月上半月，“应抗”在京山天王寺附近两次打退进攻京山县城的日军，保卫了丁家冲、王家松林和八字门一带的游击据点。

1939年2月中旬，豫鄂边区党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司令李先念（化名李威）于随县长冈店与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军事部长陶铸等会晤，由李先念传达了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关于尽快发展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并研究了与国民党第五战区谈判、争取我党领导的武装在鄂中开展游击战争的合法性问题。在陶铸等陪同下，李先念到随县均川与第五战区特命全权代表、湖北省第三专署专员石毓灵谈判，基本达到了目的^⑭。就在这时，日寇以“扫荡”相配合，准备发动襄东会战。为了牵制日寇和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中原局决定组成以李先念为支队长的新四军挺进游击支队，开往应城、安陆一带活动。中共中央指示陶铸以鄂中区党代表的身份帮助该部队工作。从此，鄂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式发动起来了。

由于敌强我弱和国民党顽军不断制造磨擦，我党在鄂中地区最初进行的战斗只能是小规模的。在这些战斗中，陶铸在3、4月间部署和指挥的公安寨战斗和攻占云梦县城颇有影响。公安寨伏击战，毙伤敌慰劳团长（日本皇室贵族）以下20多人。攻占云梦城，毙俘敌50余人，缴获枪20余支，子弹万余发，其它军用品甚多^⑮。攻克日军盘据的县城，当时在豫鄂边区还是第一次。游击队不断给予敌伪军以严重打击。仅在大半年时间里，即摧毁了应城、天

门、云梦、汉川、安陆、孝感、京山等县除县城外所有的伪政权^⑩。至此，鄂中抗日游击战争初步打开了局面。

坚持阶段。1939年6月，李先念率新四军两个连和鄂中区党委书记陈少敏率领的部队先后到达京山大山头，与“应抗”三、四支队会师。6月中旬，在京山养马畈召开的鄂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组成新的鄂中区党委，陈少敏任书记，李先念、杨学诚、陶铸等为委员。会议根据中原局指示，决定将鄂中、豫南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委。不久，陶铸代理政委职务。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加强了鄂中区党委的领导，在鄂中敌后树起了新四军的抗日大旗，为在鄂中和鄂豫边区坚持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在武装斗争打开创建根据地局面之后，面临着各方面的建设工作。而这些工作经纬万端，需要有各方面才能的领导人。养马畈会议后，陶铸在军事、政权、经济和统战等工作方面均负有重要职责，并作出了很大成绩。

在军事工作方面，1939年12月，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扩编为挺进纵队，陶铸任纵队委员。第二年初，国民党顽固势力不断进攻平汉路东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对此，纵队委员会决定留小部兵力在鄂中坚持斗争，而以大部兵力挺进路东，反击国民党顽军的反共磨擦。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留在鄂中的部队成立路西指挥部，陶铸任指挥长。他率领三个团及地方武装，坚持同日伪顽斗争，巩固了路西抗日根据地。

在政权工作方面，1939年底，为了真正实行国民党在这年所颁布的县政府组织纲要，以推动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抗战，陶铸四处奔忙，与各县县长商讨恢复敌后政权。1940年2月，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开始了边区的民选运动，以促进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在此基础上，边区党委决定邀请基本区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负责人和开明士绅一起开会，讨论成立鄂豫边区宪政促进会。3月，在丁家冲举行的宪政促进会第一次会议上，推选陶铸为宪政促进会主席。会议通过了大会宣言，号召边区各界人民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到底。会后，宪政促进会还派人到各县去，推动各县的政权建设工作。

在经济工作方面，1939年7月，边区党委鉴于部队不断扩大，军费开支增多的情况，决定以“应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召集膏盐矿商开会，商讨增加抗日乐捐的问题。由于陶铸等工作细致有方，到会矿商或其代理人同意将抗日乐捐由每月1万元法币增加到45000元法币^⑪。

由于陶铸工作出色，在抗日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39年9月，在八字门召开的鄂中区党代会上，他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1940年5月，党中央调陶铸去延安担任新的工作。

陶铸在鄂中准备和发动游击战争，是在日寇还未占领的国民党统治区，是在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充分显示了陶铸的敏锐战略眼光和伟大创造精神。当陶铸经过两年多的战斗离开鄂中时，该地区党领导的抗日正规武装已达数千人，新四军已在鄂中大部分地区（除县城及一些集镇、交通要道外）站稳了脚跟。同时，各抗日群众团体和各级民主政权普遍建立起来了。而鄂豫边区宪政促进会的成立，标志着边区最高民主政权已初具雏形，鄂中抗日根据地已初步形成。

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使豫南和鄂东的抗日斗争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这不仅表现在为李先念、陈少敏从竹沟率部南下提供了立脚点及兵源和财源，而且，为1940年初创建的鄂东大小悟山根据地及以后开辟鄂南和石（首）公（安）华（容）等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总之，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是以鄂中为中心形成的，这对于1941年4月新四军第五师的建立及形成对武汉敌伪的战略包围具有重大意义。

（下转95页）

个童子(英雄)。这原因难道不在于他是项燕的后代吗?不然怎么会兴起得如此迅猛啊!

注释:

- ① 《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同)338页。
- ② 《汉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同)1826页。
- ③ 《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921页。
- ④ 《汉书补注》,1983年版中华书局,921页。
- ⑤ 《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76页。
- ⑥ 商务印书馆,1955年《丛书集成》初编版。
- ⑦ 参见《艺文类聚》帝王部“帝舜有虚氏”门。

⑧ 《四库全书》集部三、《小畜集》十六。

⑨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上册,《礼记正义》1311页。

⑩ 《说文通训定声》,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版。

⑪⑫⑬ 《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华书局1983年版,86页、88页、86页。

⑭ 重点号系引者所加。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史记》第一册,第21页、334页、32页、33页、295—296页、295页、338—339页、1950页。

(上接108页)

注 释:

①② 孙耀华:《光辉的业绩,前进的动力——回忆董必武同志抗日战争初期在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忆董老》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顾大椿等:《回忆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中共鄂中特委的一段工作》。

④⑥ 许子威:《记应城汤池合作事业训练班二三事》,《湖北文史资料》第1辑。

⑤ 参阅钱瑛《湖北各区工作报告》,1939年4月7日。

⑦⑧ 孙耀华:《陶铸同志战斗在鄂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

⑨ 雍文涛:《鄂中的烽燧》。

⑩⑬ 蔡斯烈:《从八条枪开始》,文史资料出版社《革命史资料》十二。

⑪ 《追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在武汉、应城、天门、钟祥、襄阳的抗日演出活动》。

⑫ 《湖北省历任军政负责人一览表》。

⑭ 参阅周志坚《创建白兆山根据地的斗争》。

⑮ 陈少敏:《艰苦奋斗的三周年》,1941年。

⑯ 陶铸:《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1941年1月15日。

⑰ 傅增学:《抗日时期应城财政工作的回顾》。